

欧盟“数字宪法”亮相 多国新规剑指垄断

科技巨头迎来“强监管”时代

梁凡

12月15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两项与网络服务有关的法案:聚焦不正当竞争的《数字市场法案》和聚焦线上非法有害内容的《数字服务法案》,目标是被称为“看门人”的大型科技公司。

事实上,除欧盟外,近年来全球不少政府监管机构都在加强对科技巨头的约束。

—

15日提交的两部法案,是欧盟近20年来在数字领域的首次重大立法。有德国媒体称之为欧盟的“数字宪法”。

根据《数字服务法》,“看门人”企业需要提高网络广告的透明度,并加强对极端言论的监管。

根据《数字市场法》,“看门人”企业不得使自营产品在自有平台上的排名凌驾于竞争对手,不能使用竞争对手的数据与他们竞争,“看门人”企业需要向监管机构告知较小规模的收购交易。

两项法案界定“看门人”企业的标准是:公司在至少三个国家开展业务,在欧洲市场收入超过65亿欧元,至少有4500万月度活跃用户。

尽管欧盟并未点名特定企业,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两项法案将适用于几家美国科技巨头,比如谷歌、亚马逊、苹果和Facebook等

公司。而在目前的欧盟境内,还没有能达到上述标准的大型科技企业。

待这两项法案通过后,欧盟监管机构将有权对违反有关法律的企业处以巨额罚款,最高可达其全球年收入的10%。

对于那些5年内被罚款3次、依然系统性地违反相关法律的企业,在没有其他补救办法可用时,欧盟将迫使其卖掉旗下部分业务,通过拆分、实施资产剥离的手段禁止不正当竞争。

目前,两项法案刚刚进入讨论细则的环节。欧盟委员会主管竞争事务的专员玛格丽特·韦斯塔格表示,她希望两项法案可以尽快通过,但可能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得到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批准。

二

多年来,与其他全球大型经济体相比,欧盟一直较为关注科技巨头公司过于庞大、遏制小公司市场竞争的问题。不过,此次欧盟数字新规的出台,却可以称得上是乘了某种全球性趋势的“东风”。

就在欧盟委员会提交两项法案的同一天,英国政府发布了酝酿已久的《在线安全立法》计划,要求大型科技企业所拥有的在线平台加强对非法内容的管控。

除此之外,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上周公布了另一项针对数字市场高科技企业的立法提案,根据该法案,违反英国数字市场竞争

规则的科技企业巨头,可能被处以数十亿英镑的罚款。

多年来,美国对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一直较为松弛,与欧盟形成鲜明对比。而随着科技公司对国家与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监管者和立法者对此也越来越担心。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12月14日宣布,要求九家大型科技公司共享有关如何收集和使用其用户数据的信息。

不久前,FTC和来自48个州及地区的总检察长联合提交了两份针对脸书的独立反垄断诉讼。今年10月,美国司法部曾起诉谷歌,称其涉嫌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打压竞争对手,这成为20多年来针对科技巨头的最大反垄断诉讼。

据了解,FTC从2019年开始便已对亚马逊、苹果、谷歌、脸书进行反垄断调查。

此外,加拿大、日本等国,也于近期针对大型科技企业推出了类似的监管措施。而除欧盟整体层面外,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盟国家,还制定了本国的相关规定。

三

出于触发了各国政府与民众对其社会责任与经营垄断的担忧,大型科技企业正在进入“艰难时刻”。

数据显示,自2017年至2020年8月10日,亚马逊、苹果、谷歌、脸书四家企业在全 球范围内共遭遇了17个国家和地区的84起反

垄断调查。

牵头欧盟数字新规立法工作的韦斯塔格此前称,两项法案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不能让几个公司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决定欧洲的未来,欧洲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条款和标准。

“不对称监管”是欧盟两项法案共同的监管思路。欧盟监管机构认为,相较于中小型企业,大型平台需要承担与其平台规模相符的义务。有欧盟官员称,法案的最终目标不是施加巨额罚款,而是采取补救措施,改变现状。

有评论认为,欧洲一直没有自己的互联网巨头企业。因此,欧盟试图在数字经济中开拓空间,成为隐私权和数据保护的引领者。

此外,多数欧洲科技公司正处于成长期,加强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管控,将使欧洲科技公司在本地竞争和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从全球范围看,过去几十年中,法律更新的速度远远不及科技巨头崛起的速度,公共机构对其的监管普遍难称到位。由于巨头垄断会影响中小企业存活、创新,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各国强化反垄断措施更有充足的动机。

另外,随着“数字主权”越来越得到重视,没有国家希望自己的信息市场被外国巨头完全支配,这让抵制国际互联网巨头成了一种新潮流。



孟加拉国庆祝胜利日

12月16日是孟加拉国的胜利日。图为12月15日,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建筑物被彩灯装点。 新华社发

G一周数读

新增1930万癌症病例

12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新增癌症病例约1930万,死亡人数约1000万。其中,女性乳腺癌是新增病例最多的癌症,肺癌是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癌症。

该机构表示,导致乳腺癌患病率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生活方式、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环境的变化,如推迟生育、生育人数减少、体重增加和缺乏身体活动等。

每月30万韩元育儿补助

为解决低生育率问题,韩国政府12月15日发布“第4次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根据这份计划,韩国政府将从2022年起,向有1岁以下婴儿的家庭每月提供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792元)的育儿补助。此外,韩国政府还将向准父母一次性发放200万韩元的生育补贴。

据统计,韩国2018年和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均低于1,远远达不到维持现有人口所需的2.1。

30.4%青少年离不开手机和电脑

12月15日,德国联邦健康教育中心发布2019年度“成瘾性调查报告”。调查显示,12岁至17岁年龄段的德国青少年有30.4%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手机或电脑。在2015年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为21.7%。

有德国专家表示,希望以此次调查为契机,提醒民众过度依赖网络媒体的危害性,尤其是青少年要学会“下线”。(郭济 译)

疫情压力难摆脱

辛振山

上任三个月以来,日本首相菅义伟的支持率一路走低。日本广播协会12月14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菅义伟领导的内阁支持率为42%,较上月下降14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36%,比上月增加17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日本每日新闻社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心12日进行的舆论调查也显示,菅义伟内阁支持率为40%,比上个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49%,比上个月增加13%。相比于刚上任时超过六成的支持率,菅义伟目前的处境可谓艰难。

而导致菅义伟逐渐失去民心的主要原因,是日本不断恶化的疫情形势。

自11月中旬以来,日本进入第三波疫情。12月15日和16日,日本全国死亡病例均达53例,超过8日和14日单日新增死亡病例47例的纪录,达到新高。日本现有重症患者病例数15日也达到592例,同样创下新高。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日本政府抗疫顾问和一些专家纷纷呼吁暂停或调整旨在推动国内旅游消费的“去旅行”政策。但菅义伟却认为“无证据显示疫情是因旅游而起”,拒绝暂停该政策。

日本广播协会的调查显示,只有4%的受访者“非常肯定”日本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不怎么肯定”和“完全不肯定”的人达到56%。另外,有57%的受访民众认为应该再次发表“紧急事态宣言”。

压力之下,菅义伟于14日晚宣布,从12月28日至2021年1月11日全国暂停“去旅行”旅游补贴项目,政府将相应补偿经营方部分损失。菅义伟同时表示,目前不会宣布紧急状态,呼吁民众岁末年初安稳跨年。

尽管有人批评菅义伟此时暂停“去旅行”政策为时过晚,但此举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平息民怨。

可是他在14日晚参加了一次超过5人的聚餐活动,再次将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

14日晚,菅义伟和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等人在东京银座的一家牛排店聚餐。此事曝光后菅义伟遭到批评。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表示希望菅义伟三思而后行,立宪民主党干事长福山哲郎说菅义伟应该“自律一些”。还有网民说首相“没有给国民树立应有的榜样,令人失望”。

菅义伟在抗疫政策上的摇摆不定,与他在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之间的抉择有关。

包括“去旅行”“去就餐”等项目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是菅义伟刺激国内旅游消费、推动日本经济尽快复苏的重要手段。在菅义伟看来,只有经济复苏,才能稳固执政。

菅义伟提振经济的决心,可以从日本政府一系列刺激政策看出。

12月15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推出财政支出规模超过19万亿日元的本财年第三次补充预算,以落实日本政府12月8日推出的总额超过73万亿日元的第三次经济刺激计划。今年4月和5月,日本政府曾两次推出经济刺激计划,总额超过230万亿日元。

在菅义伟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推动日本经济朝着绿色化、数字化转型,既是促进经济从疫情中恢复的重要手段,也是确保日本经济增长的中长期战略。另外,经济转型也是菅义伟有意打造的区别于安倍政权的特色之一。

除了提振经济,在明年如期举办奥运会也是菅义伟的重要目标。实际上,举办奥运会本身就是提振经济的重要机遇。

然而,随着疫情蔓延,认为菅义伟政权缺乏行动力的人在增多,支持取消或再次推迟奥运会的人也在增多。

有日本媒体分析认为,如果菅义伟防控疫情失策,或将使成为日本另一“短命”首相。

世界经济论坛：

数字经济发达等因素让部分国家在疫情中表现更佳

据新华社日内瓦12月16日电(记者凌馨)世界经济论坛16日发布2020年特别版《全球竞争力报告》说,数字经济发达、社会保障健全和医疗体系有效的经济体在新冠疫情中保持了更强韧性。

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引发的深度经济衰退仍在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而言,部分国家更为有效地应对了疫情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的挑战,这些国家的综合特点是拥有发达的数字经济和健全的社保体系,成功规划并综合运用了卫生、财政和社会政策以及拥有流行病防控经验。

报告同时提出后疫情时代促进经济振兴和转型的四大路径,即改善政策环境,重点包括改进公共服务、规划和管理公共债务等;优化人力资本,包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实施大规模技能培训等;改革市场机制,涉及提升金融体系包容性、改革竞争和反垄断政策等;改善创新生态,鼓励公私部门加大研发投入。



宁胜男

2020年临近年底,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抗议运动将印度送上了全球新闻的头条。

一场声称要“消除中间人剥削”“赋权农民”的市场化改革,缘何会引发农民群体的广泛怒意,甚至遭受大规模的民意反噬?其背后折射的,是印度农业和农民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多重困境。

被中间商剥削还是被大资本压榨

2020年9月,印度议会通过了三项农业改革法案,分别是《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基本商品(修正)法案》和《农民(授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

新法案之下,国家不再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同时取消对基础农产品的最低支持价格(Minimum Support Price,简称MSP),农民具有更大的交易自主性,可自由定价,直接向求购者出售农产品。一言以蔽之,印度政府要推进农产品交易实现市场化。

过去,印度实行的是具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农产品购销制。农民将作物拿到政府指定的市场(即称“曼迪斯”)上,由经政府许可的特证中间商进行收购。

为防止“谷贱伤农”,政府对大米、小麦等基本农产品规定最低支持价格“保底”。中间商由政府指定,主要由大地主、大买办商人和



约旦首都安曼发现古罗马建筑遗址

近日,工人在约旦首都安曼市中心开挖排水系统时,发现了一处古罗马时期建筑遗址,包括古罗马浴场、地窖和焚烧间。图为12月14日,考古人员在遗址挖掘现场工作。

新华社发(穆罕默德·阿布·古什 摄)

抗议“黑法”:印度农业和农民的多重困境

阅 读 提 示

印度政府推出农业改革法案,一是要推进农产品交易实现市场化,二是要减轻财政负担。但是这一改革忽略了个体小农缺乏议价能力的现实,也剥夺了农民的最低生计保障。而在农民抗议的背后,其实是农业和农民在印度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弱势处境。

大代理商来充当,这些群体垄断农产品收购业务,其给农民开出的收购价远远低于农作物的市场售价。

也正因此,此次改革意在取消中间人制度。莫迪宣称,三项农业改革法案是印度政府“几十年来首次推出的让农民受益的法律”,“将在推动农业改革的同时,更充分地赋权农民”。

但是,莫迪的说法农民并不买账。中间商主导的购销制确实存在大量压榨和贪腐行为,但最低支持价格毕竟充当了不景气年份的“安全网”,给了印度千万小农们以最低保障。

一旦这一制度被打破,农民被完全抛向市场,虽然可以直接与企业进行所谓“自由交易”,但个体小农根本无法与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大资本讨价还价,莫迪所声称的“还农民以自由”在现实中就成了空谈和妄谈。

因此,农民将三项改革法案称为“黑法”,强烈要求政府予以撤销,并恢复最低支持价格体系。

政府欲借改革减负

从莫迪政府自身角度来看,农业市场化改革还有另一重含义,即削减补贴,减轻财政负担。

在传统购销制度的另一端,印度国有食品公司(FCI)将粮食投入到公共分配系统,通过遍布全国的平价商店低价供给贫困人

群。其售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差额,由政府向FCI提供食品补贴来弥补。此外,印度政府还对良种、化肥、用电等农业生产环节给予补贴,一些邦甚至对农业用电免费。

食品补贴、化肥补贴等项目构成公共财政支出的“大头”,带来严重的财政负担。但政府财政收入有限,莫迪又希望将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因此迫切要缩减农业补贴支出。在莫迪政府看来,推进农业市场化运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

小农生计被遗忘和被损害

印度传统上是农业大国,农业构成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历史上,小农经济构成印度建国的基础,甘地就曾设想将印度建设成“村社共和国”,以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小农耕织为主业。

建国之后,由于土地改革并不彻底,印度农业仍然以高度碎片化的小农作业为主。据农业部2015年至201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超过85%的印度农民仅拥有不到2公顷的土地,拥有超过10公顷土地的农民人数占比不到1%。

近年来,虽然农业产出占印度GDP的比重已降至15%,但农业仍然吸纳了印度近一半的劳动力,直接关乎千万家庭的生计。

然而,农民饱受债务重压、环境污染、水资源枯竭和不稳定气候条件等问题困扰,导致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印度,在21世纪

的今天,每年仍有多达1万名农民在绝望中自杀,不得不说是对印度“增长奇迹”的莫大讽刺。

加快工业化进程,成为制造业大国,是莫迪为印度规划的“康庄大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莫迪在国内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统一税制,建设智慧城市,大力引进外资,推进“印度制造”计划。

但是,在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建设中,农民和农业似乎被抛诸脑后,除了在选举时向农民大做福利许诺之外,莫迪政府在过去6年几乎没有推出任何改善农民境遇的实质性举措,承诺的福利也一一落空。

为了帮助印度的仿制药出口,莫迪政府还向美国许诺,要放开国内农产品和乳制品市场。一旦成行,短期内农民利益将进一步受损,难怪农民公然喊出“莫迪下台”的口号。

在一个过半人口从事农业的大国中,莫迪政府的市场化改革虽立意良好,却忽视了高度分散的小农缺乏议价能力的现实,同时又要剥夺农民的最低生计保障,恐怕很难取得成功。

从政治上看,莫迪改革如此狂飙突进,背后倚仗的是高支持率。但是,高人气并非坚不可摧,印人党在地方选举的失利就说明这一点。

目前,印人党单独或联合执政的邦占全国总面积的比例已经从两年前的71%滑落至35%。可以预见的是,经过此次农业改革风波,“莫迪光环”在印度农民中的号召力恐怕会大不如前。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

G管窥天下